



01 场景复原、现代阐释，重现上元节百戏盛景

百戏是民间乐舞杂技的总称。隋时，洛阳的上元夜已经非常热闹。大业六年(公元610年)的上元节，隋文帝因为周边各族酋长来东都朝见自己，在洛阳端门街设置周围五千步的戏场，表演各种杂技、舞蹈、武术、魔术，并以音乐伴奏，声闻数十里，通宵达旦，持续半月之久。

唐代，上元节依然有百戏之俗。《玄怪录》记载：“开元十八年(公元730年)正月望夕……对曰：‘灯烛华丽，百戏陈设。’”《新唐书》中也记载了因正月望夕的节俗活动过于奢靡，大臣严挺之上疏谏言之事，其中就提到“营百戏”之奢侈，侧面表明唐代上元节有表演百戏之俗。

百戏的前身是角抵戏，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，类似于现代的摔跤或相扑。汉以后，角抵戏与其他杂技、乐舞一起构成“百戏”，成为一种集杂技、武术、滑稽表演、音乐演奏、歌唱、舞蹈等多种技艺于一体的综合表演艺术。

“百戏作为上元节节庆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，具有很强的娱乐性、互动性、观赏性。当下，我们在策划上元节文旅活动时，可以考虑用现代人喜闻乐见的方式，重现当年的百戏盛景。”市隋唐史学会会长王恺表示，重现百戏盛景有两种思路：一种是场景复原，比如让演员穿上古装，邀请戏曲、杂技演员和乐师到灯会现场表演，营造“人在戏中游”的沉浸氛围；另一种是现代阐释，比如在灯会现场举办音乐节、美食节、街舞赛等，打造具有时尚感的现代版百戏。

腊月已至，年味越来越浓。眼下，我市正在积极筹备春节期间的各类节庆活动，其中，传统悠久、规模盛大、内容丰富的大型灯会活动，总会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游玩。历史上的上元节活动，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，除了观灯，都城洛阳的百姓还有哪些习俗？对当下举办相关活动有何启示？记者近日就此进行了采访。

02 全民变装、一秒穿越，打造上元节“百变大咖秀”

西方有万圣节，这一天，孩子们喜欢挨家挨户讨要糖果，大人们则会穿上各种奇怪的服装，举行各种庆祝活动。其实，中国古代的上元节也有变装之俗，在这一天，大家会戴上面具，穿奇装异服出门观灯，一起闹元宵。

变装这一习俗起源于驱鬼祭祀活动，南北朝时成为上元节期间的一项游戏，隋唐时期发展成一种习俗。《隋书·柳彧传》记载：“每以正月望夜，充街塞陌，聚戏朋游。鸣鼓聒天，燎炬照地，人戴兽面，男为女服，倡优杂技，诡状异形。”意思是说，当时的人们纷纷戴着面具出游，里面既有“女装大佬”，也有各种酷炫极致打扮的

人齐聚洛阳街头。

“变装不仅是古人的游戏，也是深受当代人喜欢的一种娱乐方式。比如，在年轻人中愈加兴盛的Cosplay(角色扮演)文化，让大家可以通过扮演喜爱的虚拟或现实角色，表达自我，寻求快乐，获得情绪价值。”王恺说，当下，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元素的融入，Cosplay的本土化趋势日渐明显，身着国风服饰和扮演国产游戏角色的爱好者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他建议，上元灯会活动可以策划开展“百变大咖秀”活动，吸引各路Cosplay爱好者、汉服爱好者等群体来到洛阳为自我认同发声，让传统的上元灯会活动焕发出新生机。

03 巧用真人NPC，让历史文化“活”起来

中国古代有宵禁制度，从汉代起，平时严格“禁民夜行”的规定在上元节时会变得宽松。执金吾在正月十五夜，可破例弛禁“放夜”，允许一些官方和民间的习俗活动进行。

到了里坊制度完善的唐代，宵禁制度更加严格。唐朝的《官卫令》规定：每天早上五更后，就敲响四百下“开门鼓”；而到了傍晚时分，就敲响六百下“闭门鼓”，宵禁之后不允许外出。但在上元节期间，官府会解除宵禁，让百姓出门活动。在武则天时期，为了庆祝上元节，在正月十五、十六两日不再宵禁，允许百姓张灯结彩。唐玄宗时期规定，正月十五前后二夜，“金吾弛禁，开市燃灯，永为式”。

“金吾不禁夜是上元节独有的待遇，它释放出大量的夜间娱乐需求，带动了旅游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。此外，宵禁作为一种古代特色文化，也可以作为一种文化元素植入现代灯会活动中。”王恺建议，可以在上元灯会活动开场前，安排真人扮演金吾卫，结合《官卫令》中的记载，通过擂鼓、喊口号、举标志牌等方式表

现“放夜”“解禁”等文化元素，通过营造有仪式感的开场活动，带给游客沉浸式体验。

此外，唐代上元节还有迎紫姑的习俗。唐代诗人李商隐在他的《正月十五闻京有灯恨不得观》中写道：“月色灯光满帝都，香车宝辇隘通衢。身闲不睹中兴盛，羞逐乡人赛紫姑。”这里的“赛”是一种迎接方式。

王恺说，紫姑是中国民间传说中一个善良、贫穷的姑娘。正月十五，紫姑因穷困而死，百姓们同情她、怀念她，有些地方便出现了“正月十五迎紫姑”的风俗。紫姑又名“厕神”，有预知未来的本领。古人默默将自己的心事说与紫姑听，有助于愿望的达成。因此，可以在灯会现场安排紫姑真人NPC，设置许愿互动游戏，积极与游客互动。

洛报融媒记者 刘嘉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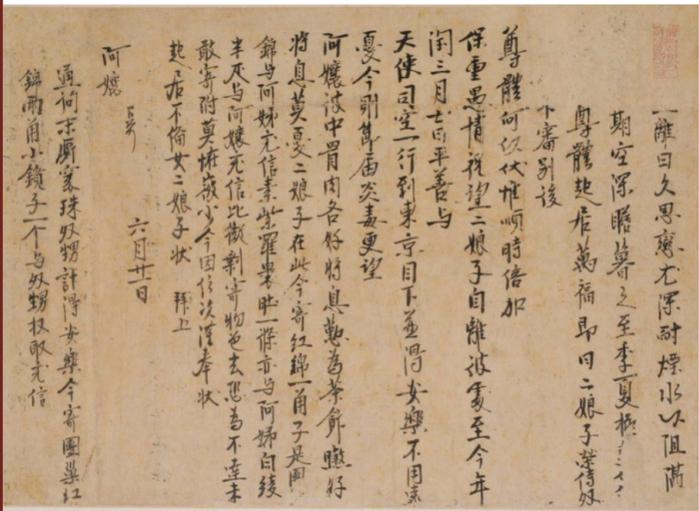
再现古都灯会盛景 巧妙植入文化元素

河洛广记
鸿雁传书系列

最早的家书实物

□郑贞富

最早的家书实物，是敦煌遗书《二娘子家书》。这是唐代一位名叫二娘子的女性，在洛阳写给其居住在敦煌的母亲的书。这封家书最初被用来裱糊佛经，贴在佛经的背面，后来被封存于敦煌藏经洞。晚清翰林许承尧在整理敦煌写经时，发现了这封家书。这封家书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院。



《二娘子家书》

《二娘子家书》的内容

《二娘子家书》前有残缺，现存内容如下：

一离日久，思恋尤深，耐烟水以阻隔，□□□□，空深瞻暮之，至季夏极热，伏惟尊体起居万福，即同二娘子荣侍。外申□□，别后尊体何似，伏惟顺时，倍加保重，恩情祝望。

二娘子自离彼处，至今年闰三月七日平善，与天使司空一行到东京。目下并得安乐，不用远忧。今则节届炎毒，更望阿娘、彼中骨肉，各好将息，勤为茶饭，然好将息，莫忧二娘子在此。

今寄红锦一角子，是团锦，与阿姊充信；素紫罗裹肚一条亦与阿姊；白绫半匹，与阿娘充信。比拟剩寄物色去，恐为不达，未敢寄附，莫怪微少。今因信次谨奉状，起居不备，女二娘子状，拜上。六月廿一日。

阿娘：日前，通商末厮、寰珠、外甥，计得安乐。今寄团巢红锦两角、小镜子一个与外甥收取充信。

在这封家书中，有几个陌生词，但它们是唐代书信的常用语。“平善”，意思是一切平安。“充信”，意思是作为信物。“末厮、寰珠”，指家中的男仆、女仆。这封家书，翻译成白话文是：

自从离开家乡已经很久了，思念之情越发深切，但因路途遥远，难以相见。夏季酷热，希望母亲身体健康，一切安好。

自从离开家乡已经很久了，思念之情越发深切，但因路途遥远，难以相见。夏季酷热，希望母亲身体健康，一切安好。

自离开家乡已经很久了，思念之情越发深切，但因路途遥远，难以相见。夏季酷热，希望母亲身体健康，一切安好。

母亲：日前，通商众仆、外甥，估计都安好。现寄上团巢红锦两角、小镜子一个，请外甥收下作为信物。

这封家书的重要信息

《二娘子家书》包含了很多重要信息，二娘子所寄物品共五种：红锦一角子，是团锦；素紫罗裹肚一条；白绫半匹；团巢红锦两角；小镜子一个。

这里的“角子”“匹”是丝绸的计量单位，一角子是四分之一匹。团锦、白绫、团巢红锦、素紫罗，都是名贵的丝绸。大唐东都洛阳，是丝绸纺织业和丝绸贸易的中心。龙门石窟中有两个像龕是唐代洛阳北齐市绢行商人出资开凿的，它们是北齐市彩布行净土堂、北齐市丝行像龕。从这两个洞窟的题记可知北齐市绢行经营规模之宏大、行会组织之完善。

在敦煌遗书中，有大量关于洛阳丝绸的资料。开元二十三年(公元735年)《沙州会计簿》63号文书：“贰拾六匹河南府生施。”天宝二年(公元743年)《交河郡市估案》：“河南府生施壹匹直钱陆佰叁拾文，次陆佰贰拾文，下陆佰壹拾文。”河南府，即洛阳。生施，是一种厚丝绸，用柞蚕丝织成，目前仍是嵩县特产。

《二娘子家书》提到的小镜子，应该是做工精良的洛阳铜镜。洛阳是唐朝铸币业的中心，铜镜的制造是重要的行业之一。唐代洛阳铜镜是古代铜镜艺术的巅峰，其形式多样，包括葵花镜、方形镜等，纹饰则以花鸟为主，寓意吉祥，充满了生活气息。铜镜的设计简洁而不失华贵，充分体现了唐代社会的繁荣与文化的多元性。当时，铜镜常常作为礼品赠送，象征着美好的祝愿和深厚的情感。同时，铜镜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，在丝路沿线出土的不少唐代铜镜，与洛阳出土的大量唐代铜镜质地和工艺相同，它们显然是洛阳制造的。

在《二娘子家书》中还有很多未解之谜：二娘子为什么来到洛阳？此书信写于哪一年？

《二娘子家书》的内容为我们提供了

关于二娘子为何来到洛阳的重要线索。家书中写道：“二娘子自离彼处，至今年闰三月七日平善，与天使司空一行到东京，目下并得安乐。”这句话明确指出了，二娘子是从敦煌出发，与“天使司空”一同前往东京洛阳的。

“天使司空”是一条重要的线索。在唐代，“天使”通常指的是朝廷派遣的使者，而“司空”则是工部尚书称呼。唐朝，在洛阳设六部，工部是其中之一，长官是工部尚书。《二娘子家书》首先出现“茶”字，在此之前，写作“茶”。

把“茶”简化为“茶”的是《开元文字音义》，是开元二十三年编撰的一部官书。因此，《二娘子家书》必写于此年之后。书中提到了“闰三月”，因为从开元二十三年到“安史之乱”爆发后丝路不通，中间只有一年是闰三月，就是天宝十一载(公元752年)。因此，《二娘子家书》写于此年的六月廿一日。

按《洛阳通史》第三卷的考证，天宝十一载，任洛阳工部尚书的是颜真卿。在此之前，他任东都采访判官、殿中侍御史。他在天宝十载(公元751年)到了敦煌，代天子巡视，娶二娘子为妻。二娘子的本名叫韦芸。

《二娘子家书》采用的纸张为大幅白麻纸。白麻纸属于古麻纸，是中国最古老的手工纸品。此家书用纸幅面宽大，纸质略硬，表面粗糙。虽经千年之久，纤维变质，色呈褐黄，然至今不腐，未被虫蛀，展现出洛阳古老手工纸品的优良品质。

稀世珍宝的传承

敦煌遗书，又称敦煌文献、敦煌文书、敦煌写本，是对1900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17号洞窟中的一批书籍的总称，指敦煌所出公元2世纪至14世纪的古写本及印本。

敦煌遗书的种类繁多，包括汉文、藏文、回鹘文、粟特文、梵文等多种文字。其中，汉文遗书数量最多，总数约为58000件，占遗书总数的绝大部分。这些汉文遗书，不仅包含了大量的佛教文献，还涵盖了道教经典、传统经史子集、俗文学、医学、史地著作等诸多领域，展现了古代文化的丰富多彩。

自1900年敦煌遗书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，秘藏多年的敦煌文献随即流散，许多完整的写经卷均被国外的探险家劫掠。直到1910年，清朝学部才将劫余部分运到北京。敦煌文书大部分是手卷，用纸或绢从右至左抄写，然后粘接成长卷，最长的有十几米，所以也叫敦煌卷子或敦煌写卷。

许承尧，安徽歙县人，晚清翰林。

自1913年起，许承尧任甘肃省政府秘书长，此后8年，5次奔赴敦煌搜集敦煌写经，成为我国敦煌写经的重要私人藏家之一。

安徽省博物院现存许承尧旧藏敦煌文献23件套，其中《二娘子家书》等都是许氏“晋魏隋唐四十卷写经楼”所藏精佳之作，流传至今，实乃不易。

《二娘子家书》，纸本，纵31.6厘米，横43.4厘米，字19行。书写流畅自如，提按清晰，结字略长，近似欧阳询风格。此家书系许承尧从敦煌写经的裱槽纸上揭出，乃旷世奇珍。许承尧珍爱不已，在其右上角钤“歙许菴父游陇所得”朱文长方印，1934曾两度作跋，并抄录友汪律本《八声甘州》一词。此外，他还邀请当时名流雅士方兆璠、何振岱、程炎震、李景瑩、吴承仕为其作跋题，共同研究疏证，题跋吟咏，连同家书一起装裱成册。在《疑庵所藏书录》中，许承尧写道：“奇品，有检斋诸人题，唐人家信，旷世所无。”

日报云阅读

扫码阅读该系列已刊发文章

